

第二卷

中華史鑿

赵祿祥 主编

北京出版社

CHINA

CHINA

中華

CHINA

史 記

CHINA

ZWJC
2003
K22
49
:2

中华史鉴

第二卷

国史镜鉴（下）

赵禄祥 主编



北京出版社



3 0743 3000 6

CHINA

治军篇

CHINA



一、居安思危

楚庄王胜不忘戒惧

中国有句成语：“骄兵必败”，是说骄傲的军队必定打败仗。骄傲轻敌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于取得了战争胜利者来说，更容易犯此类错误。在中国历史上，胜骄致败者不乏其例，其惨痛教训为不少名君良将引以为戒，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在胜利面前格外注意，不骄不躁，整军备战，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一位贤明的主帅。

楚庄王（？—前591），姓非（mǐ，米），名旅（一作吕、侣），周顷王六年（前613）即位。即位之初，楚国的军政大权，多为大贵族若敖氏一族垄断，庄王因自身力量薄弱，尚不能直接控制国家权力，只好暗中静观变幻的风云而胸有成竹。用他自己的话讲：此鸟“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①。

楚庄王三年（前611），楚国发生饥荒，位于楚国西北的庸国叛楚发难，联合“群蛮”，准备进攻楚国。楚庄王在此关键时刻，亲自率兵西指，大败庸兵，取得了灭亡庸国的胜利。庄王利用灭庸的威信开始整顿内政，选贤任能，进行军事改革，制定了“先南后北，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争霸战略，楚国在庄王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屡败诸侯，连连取得战争的胜利。

楚庄王兴师灭庸安定了西北。又随着灭庸，楚国声势大震，南方诸侯的反叛活动也随之平息，使楚国北上争霸有了稳固的后方。庄王六年（前608），楚庄王举兵北上，开始了与中原大国晋国争霸的战争。是年秋，首先向背楚附晋的陈、宋两国进攻。晋为救援陈、宋，派军攻郑。楚军援郑，在北林（今河南郑州东南）击败晋军，并俘其大夫解扬。庄王七年（前607），楚庄王又命令郑军攻宋，战于大棘（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大败，缴获战车四百六十乘。当年秋，晋国会同宋、卫、陈攻郑，欲报大棘战败之仇。楚军援郑，晋军不敢与楚决战，主动撤军而去。结果，楚庄王的威望在中原各国诸侯心目中大大提高。

此后，庄王八年（前606），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陆渚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

^① 《史记》卷40《楚世家》。



楚师直达京师洛邑附近，楚庄王竟在周王眼下阅兵，“问鼎之大小轻重焉”^①，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使后人无法遗忘的“问鼎中原”之壮举。当然，楚庄王也清楚，不征服晋、秦大国，要取周王室而代之是不可能的，他听取了周王使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劝告，率军返国。

庄王九年（前605），楚庄王平定了若敖氏的反叛后，于庄王十三年（前601），灭掉群舒中的舒、蓼两国，降服了吴、越。庄王十六年（前598），楚庄王为了彻底解决“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②的郑、陈等小国所向，使之归附于楚，借陈灵公被大臣夏征舒杀死事件，出兵伐陈，杀死了夏征舒，灭陈为楚国县邑，后又为争霸利害所考虑，灭陈又复陈，取得了“诸侯闻之，皆朝于楚”^③的效果。

降服了陈国，楚庄王立即用兵于时服时叛的郑国。十七年春（前597）楚师围郑，经三个多月的围攻，郑襄公姬坚“肉袒牵羊”至大路请降，以“唯命是听”而屈服。晋国闻讯郑国被围，晋景公姬孺立即派荀林父为大将，率师往援救郑。于是，晋、楚之间爆发了春秋时期著名的大战——晋楚郟（今河南荥阳东北）之战。楚军在庄王的率领下，再取克捷，打败了晋军，最终登上了中原霸主的地位。郟之战后，楚庄王面对黄河举行了庄严的祭奠仪式，然后率部凯旋而归。

楚庄王虽立马黄河，实现了先人的遗愿，但他并不骄傲而懈怠。郟之战的当年冬，再灭萧国（今安徽萧县）。十九年（前595）楚军包围宋都商丘。宋向晋告急，晋认为“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④，不出援兵。楚围宋都九个月。最后，宋国降服楚国。晋楚争霸，楚庄王取得胜利。

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与诸侯征战连年不断，先后灭掉庸、舒、蓼、萧，降服吴、越、陈、宋、郑，经过郟之战，打败占据霸主地位几十年的强敌晋国，称霸诸侯，雄踞大江南北。史称：在庄王领导下，楚国“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⑤，可称得上春秋诸侯的佼佼者。

然而，楚庄王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可贵的一点在于他能在一系列胜利面前，胜不忘戒惧，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安内攘外，整军经武的治国方针，并谆谆教导楚国军民，在胜利面前要力戒骄傲，谨防轻敌麻痹思想，要求将士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楚庄王的这种胜不忘戒惧的指导思想是他连战克捷，无往不胜的坚实保证。即使是楚国的死对头晋国有见识的大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十七年（前597）春，楚军围郑，晋国大将荀林父率三军救郑。当时晋军一些将领认为，楚国连年屡打胜仗，已是骄兵怠惰。此次楚军围攻郑国也已逾三月，实已疲劳。以大将先轸为首的一批将领主张对楚作战。但晋军下军佐栾书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计军实而申傲之于胜之不可保，封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

① 《左传》宣公三年。
② 《左传》文公十七年。
③ 《淮南子·人间训》。
④ 《左传》宣公十五年。
⑤ 《韩非子》卷2《有度第六》。



以若敖、蚡冒筭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① 栾书在这段话中总结了楚庄王常胜不衰的经验：胜而不骄，戒而不怠。

楚庄王自从灭掉庸国以来，他没有一天不在告诫国人和军队，千万不能松懈戒备和警惕。他以历史上商纣王百战百胜，但在胜利面前却丧失警惕，骄奢淫逸，安而忘危，以致周武王兵临城下，才仓促应战而兵败身亡的经验教训，教育国人和军队，“戒惧之不可以怠”，要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否则祸患很快就会降临。楚庄王正是基于这种“戒惧”思想，胜而不骄，常备不懈二十余年，才取得连战皆捷，始终处于不败的战绩。

同时，楚庄王在领导楚国走上强盛之路，成为诸侯大国之后，他十分重视对国人进行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他一再告诫军民，不要忘记国君若敖、蚡冒在创业时期驾着柴车，身着破衣，去开辟山林的艰辛。教导楚国军民懂得，只有勤劳生产国家才能富足，军事力量才能强大的道理，鼓励国人努力生产，发展经济，使楚国上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向上精神。栾书也正是以此认为楚军虽胜，但“不可谓骄”。

楚庄王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注意在胜利的形势下不断地对军民进行胜而不骄不躁、强而不忘生产的思想教育，不断地进行整军经武，提高军事力量，加强警惕和戒备，使楚军始终具有旺盛的战斗力的地位。楚庄王这种胜而不忘戒惧的思想，值得后人学习和效法。

魏绛规谏晋悼公“居安思危”

在中国历史上，“居安思危”的军事思想一直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和遵循，成为国防建设和军队治理的指导思想。最早明确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魏绛。

魏绛，晋国人。曾任中军司马，新军佐将，治军严格，颇有战略头脑，为使晋国在与楚国争霸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周灵王二年（前570），他向晋悼公提出了联合诸戎，稳定北方的策略，为悼公所采用。晋国出现了“戎大亲附”的局面。由于与诸戎言和，晋无后顾之忧，能举其全力南向，势力更加强大，诸小侯国纷纷倒向晋国。悼公又把晋军分成三部分，轮换与楚军作战，曾三次联合齐、鲁、宋、吴诸国军队，兴师讨伐左右于晋楚之间的郑国，使楚军疲劳不堪，造成“晋悼三驾而楚不敢与争”的格局。^② 动摇于晋楚的郑国，最终请和于晋。晋国遂确立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郑国在归降晋国时，送给悼公一大批礼物，其中包括三位晋国有名的乐师，另有广车十五辆，辘车十五辆，兵车百乘，歌钟两架和搏、磬等乐器，以及女乐两侑十六人。丰厚的礼品使晋悼公喜笑颜开，下令，“以乐之半赐魏绛”^③。

晋悼公高兴地对魏绛说，晋国今天取得的胜利是你力主不动刀兵，与戎族和好的结果。晋国在八年中间，九次会合诸侯，事情办得就像音乐那样和谐，现在郑国降服，送来礼乐，我想“请与子乐之”^④，让我们共同来享受这些美妙的音乐吧。晋悼公认为大

^① 《左传》宣公十二年。

^{②③④} 《左传》襄公十一年。



功告成，洋洋得意，着实想好好享乐一番。

魏绛在胜利面前头脑却十分清醒，不居功，不自傲，向悼公辞谢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愿，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① 魏绛把晋国取得的胜利归功于国家的福命、晋悼公的威灵和众位卿大夫的辛劳，谦虚地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劳可言。接着，魏绛针对楚已衰落，郑已归降，霸业已定的形势，非常有见地地向晋悼公进言道：“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②。他忠告悼公戒骄息，在享受这种快乐时，又要想到它的终了。魏绛进一步向晋悼公进言说：什么是“快乐”呢？《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③ 镇抚天下的家邦，同别人共享福祿，治理好附近的小国，使他们相率服从，这才是君子的快乐。郑国向君王献上钟乐，而音乐是用来巩固我们的思想和意志的。君王您要勤于政务，“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祿、来远人。”^④ 只有这样，才是您所说的“与子共乐之”的“所谓乐也”^⑤。

那么，什么是“终”呢？魏绛进一步向晋悼公解释说：

《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⑥

我们晋国现在复霸业，诸侯臣服，国势日强，您君王可以开始享受到这种快乐，但是，在安定太平的时期，您要想到战争的危險，不要因胜利而骄傲，要思则有备、常备不懈，这样才能免遭祸患，常治久安。

悼公听后深感言之有理，虚心地向他表示接受，他说：“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⑦。晋悼公不愧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在胜利的形势下能听得进臣下的意见。在此之后，晋悼公按照魏绛的“居安思危”思想，安不忘危，常备不懈，保持了多年的戒备。

自从魏绛明确使用“居安思危”概念后，这个成语就成了人们应付战争和其他不测之事的常用语，而且作为国防战备和军队治理方针，一直为历代兵家所继承。

秦始皇御边固国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有一组著名的《古风》诗。其中一首热情洋溢地讴歌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历史功绩：“秦王扫六合，虎踞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的确，秦始皇在我国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地位。他重才任人扫灭六国，开创封建大一统帝国新纪元，对后世历史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御边固国、加强战备则是其历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战国以来，活动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主要有三支：匈奴、东胡、月支。其中又以在蒙古高原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人更为强大：“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⑧ 当时，匈奴贵族趁中原各诸侯国纷争之际，不断进行侵扰劫掠，并进占了秦北部河套地

^{①②③④⑤⑥⑦} 《左传》襄公十一年。

^⑧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区。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后，匈奴势力依然十分嚣张。它经常南下袭扰，掠夺内地的人畜和财物，对秦政权的稳固构成严重的威胁，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亡秦者胡也”^①的说法。

为了解除匈奴南下之患，巩固北部边境，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朝廷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胡，略取河南地”^②。秦军在蒙恬指挥下，长驱直入，横扫塞北，“却匈奴七百余里”^③。次年，蒙恬继续北进，占领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南）、北假（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进而控制了阴山和阳山之间的孔道。匈奴在秦军的凌厉打击下，败走北遁，这就是贾谊所谓的：“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④

但光赶跑匈奴还是不够的，为了巩固边防，秦始皇进而又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是在新占地设置郡县，移民实边。秦收复河套地区后，始皇即在那里分设了44县：“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⑤，并建筑了几十座城堡。同时“徙谪，实之初县”^⑥。秦始皇三十四年更进一步迁内地民众三万户移居北河（今内蒙古、宁夏一带）。

第二，筑长城为备御匈奴进犯作万全之策。在北逐匈奴取得胜利后，秦始皇即下令由蒙恬率士兵、役夫和刑徒约五十万人大规模地“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⑦。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北方长城基础上，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袤延五千多公里的万里长城。它起到了“以墙制骑”的重要作用。

第三，开辟直道，提高军事交通、通讯效率。秦始皇三十五年，由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蜚山堙谷，千八百里”^⑧，它的开辟，使京师咸阳和北部边关连结在一起。平时边地军民屯垦耕作；一旦有警，长城戍卒点燃烽火，将领便可根据敌情作出部署，且可沿直道，征调内地部队。这样就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在重点加强北地防御的同时，秦始皇还兴平“百越”、南戍五岭之举。秦灭六国后，派遣屠睢统率五十万大军分兵五路进击岭南。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先后平定百越之地，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并在那里新设了闽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尔后又征发中原几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

秦始皇这些御边固国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尤其是修筑长城这件事，就军事意义而言，对当时直至后来历代封建王朝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是有一定价值的。所以西汉名臣主父偃称长城为“灭胡之本”^⑨；明朝边臣余子俊也誉长城为“不战而屈人兵之计”。这是公正的评价。

然而，秦始皇在推行御边固国措施过程中，也有严重的失误。当时战乱刚刚平息，人民十分困穷：“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⑩，这样无节制动用巨大

① 《资治通鉴》卷7《秦纪》2“秦始皇三十二年”。

②⑤⑥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③④ 贾谊《过秦论》。

⑦⑧ 《资治通鉴》卷7《秦纪》“秦始皇三十三年—三十五年”。

⑨ 《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⑩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



人力物力，实为民众所不堪，“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①结果引起民众的愤慨，民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集中反映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它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我们今天在评价秦始皇固国御边政策时，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肯定其历史作用，同时指出其弊端。

杜预居安思危常备不懈

一般情况下，当战事平息，天下重归安定之时，人们普遍容易滋生和平麻痹情绪，出现所谓“刀枪入库”、“放马南山”的现象，这对国防建设是极其有害的。所以历史上不少头脑清醒的人士，总是在那里大声疾呼居安思危，强调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以应付任何不测事件的发生。西晋时期的杜预，就是这类人士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是西晋初年重要军事家、政治家、经学家。他精通典籍，长于谋略，通晓兵法，“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②，堪称历史上文武全才型的人物。据史籍记载，杜预一生耽思经籍，先后“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③等等，他晚年所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一书，论证严谨，考辨精微，是一部历代学者所推崇的学术著作。由于杜预文名颇盛，所以他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个文弱书生。其实杜预在军事上很有建树，他从戎多年，担当一方军事统帅，在制定灭吴军事方略一事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于西晋迅速取得灭吴战争的胜利，则更与他的高明指挥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预是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当之无愧的关键性军事人物之一。所谓“平吴之谋，始于羊祜。祜卒，举杜预以终其事。”^④

由于杜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⑤，富有政治家的长远眼光，因此，在军事问题上，他的见识要远远胜过普通的将领。这也反映在他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深刻认识上。

西晋灭吴后，朝廷上下一片歌舞升平，纵情享乐。武帝司马炎以为天下已经统一，不会再有战争，便要将领们不再从事军事活动而改管政治事务，并下达诏令解散州郡兵。在生活上，武帝也广充后宫，淫佚糜烂，醉生梦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武帝的影响下，西晋一些将领纷纷贪图享受，穷奢极欲，不再以军事为意。王濬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人在灭吴之战中功勋卓著，但在灭吴后，却“以勋高位重”，“乃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⑥，死后又大营茔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通病。

然而，杜预并没有以吴国灭亡、天下归于一统而高枕无忧。在当时杜预已是年届六旬的老人，又以灭吴之功而被封为当阳县侯，可谓是齿长位尊，按理说完全可以摆脱日常军务，颐养天年。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一再强调“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为此，他积极加强戒备，进行军队建设，并“勤于讲武”^⑦，将大量精力投入于讲授兵法、训

① 《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②③⑤⑦ 《晋书》卷34《杜预传》。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晋”。

⑥ 《晋书》卷42《王濬传》。



练士卒。在还镇襄阳期间，他采取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办法，妥善解决边远山区一些少数民族不安定问题，然后严加守备，交错屯兵，“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①。

当然，西晋王朝的忘战偷安状况不是杜预个人能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的。所以杜预身后不久，西晋王朝内部即爆发了八王之乱，尔后又导致南北长期分裂。虽然说西晋王朝的内乱，已经不完全属于忘战偷安的问题，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可是，这种问题的出现，与西晋初期短暂的社会安全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历史变故，也从反面证明了杜预安不忘战识见的卓犖高明，足以令后人引以为鉴。

祖逖闻鸡起舞志靖中原

西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短命的朝代，当时黑暗的门阀统治，造成土地兼并剧烈，政治生活腐朽，社会风气沉沦，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关系紧张，等到那位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继晋武帝登基后，长期以来掩盖着的各种矛盾便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以汝南王司马亮等为首的皇室诸王为了争夺统治权，互相兵戈相见，攻伐残杀，史称“八王之乱”。这场战乱延续16年之久，严重削弱了西晋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魏晋以来居于边境并逐渐内迁中原的匈奴、羯、氐、鲜卑、羌等少数民族，因不满西晋的残暴统治和民族压迫而纷纷起来反抗，其上层那些抱有野心的贵族则利用这一机会起兵打劫，给中原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②。中国历史重新进入动荡、变乱的阶段。

面对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不安，于是便萌生了济世匡时之志，决心尽忠报国，力挽狂澜。在这些入中间，那位后来中流击楫，慷慨渡江进行北伐的祖逖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代表性人物。

祖逖（266—321），字士雅，范阳道县（今河北涞水北）人。是东晋南朝时期第一个举兵北伐，决意恢复中原的著名将领，曾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祖逖之所以能在成年后大有作为，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人物，实同他年轻时立志高远、志存匡复、勤于习武有直接关系。

祖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西晋王朝内乱外侵将起的前夜，面对腐朽不堪的国家政治，祖逖深恶痛绝，忧心如焚。他性情豁达，轻财好义，经常“散谷帛以赈贫乏”^③，少时即在乡里享有令名。稍长，祖逖“乃博览书记”^④，涉猎古今，来往于京师洛阳，开始渐露头角，引起人们的注目，被称誉为“有赞世才具”^⑤。

祖逖二十四岁那年侨居阳平（今河北大名县东北），不久，就和中山魏昌（今河北安国西南）人刘琨一起，被官府任命为司州主簿（掌管文书簿籍的小官）。刘琨同样是一位性格豪爽、行侠仗义之士。那句世人传颂的警世名言“枕戈待旦，志枭逆虏”^⑥，就出自于他之口。共同的志趣，使这两位年轻人意气相投，情同手足。他们居住在一

① 《晋书》卷34《杜预传》。

②⑥ 《晋书》卷62《刘琨传》。

③④⑤ 《晋书》卷62《祖逖传》。



起，晚上“共被同寝”^①，时作彻夜长读。每当言及国家大事，百姓安危，双双不胜惆怅；而当说到个人抱负时，彼此又心情激荡，豪气干云。有一次，两人谈到了中原大局，这对热血青年在感慨之余便相互勉励道：“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②

英气勃勃、豪情满怀的祖逖，深知要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就必须做到文武双全、才华超群。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祖逖在认真博览群书，密切注意政局动态的同时，十分重视精练武艺，他常和刘琨一起操戈习武。在一天深夜，祖逖在梦乡中突然被荒村野外的鸡鸣声所惊醒，他展望未来，浮想联翩，再也无法入睡。于是，就用脚踢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③意思就是说鸡叫正是对我们的提醒。为了磨砺意志，苦学武艺，到时候报效国家，他们两人便披衣下床，仗剑相对起舞。这就是脍炙人口的“闻鸡起舞”典故的来历。

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轻时的勤习苦练，终于使祖逖成为一名精通兵法、善用韬略的将才。所以当晋室南渡偏安江东一隅后，祖逖即致力于恢复中原的事业。在东晋朝廷的许可下，他“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④掀起一场慷慨壮烈的北伐战争，并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晋书》本传称“祖生烈烈，夙怀奇节，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邻丑景附，遗萌载说”，这的确是对祖逖的宏大志向与不朽功业恰如其分的概括和评价。

陶侃运砖励志为效命

中国有句流传很广的著名格言，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逸”。这话很富有哲理，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大业的军事将帅来说，它尤其起着重要的警策作用。因此，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军事家，总是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高度的警觉，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遭遇逆境，都能不改自己的志向。战时慷慨赴难，平时居安思危，为后人树立了楷模。东晋时期，陶侃运砖砺志的故事，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陶侃（259—334），字士行，祖籍鄱阳人，后迁徙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东晋时期的著名军事将领，官至刺史。他一生有41年时间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颇有战功。晚年曾主持平定苏峻、祖约的叛乱，为维持东晋王朝的安宁作出了贡献。陶侃“雄毅有权，明语善识断”^⑤。时人称誉他“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⑥唐代主修《晋书》的史臣也说：“布泽坏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再宁。”^⑦对他一生功绩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陶侃能在政治、军事上有所建树，是与他平生“励志勤力”^⑧分不开的。当年，东晋王朝的权臣、手握重兵的王敦心怀异志，思图谋反篡晋。他忌于陶侃的才干和战功，处处限制打击陶侃。他的诡计曾暂时得逞，陶侃终于被调离那烽烟四起、刀光剑影的正面战场，来到偏僻贫瘠但又太平无事的广州担任刺史。

①②③④ 《晋书》卷62《祖逖传》。
⑤⑥⑦⑧ 《晋书》卷66《陶侃传》。



在广州当父母官，相当轻闲惬意。如果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肯定会是贪图安逸，优哉游哉，浑浑噩噩排遣岁月的。可是陶侃却截然不同于那一类型的人物。相反这种太平的环境，倒更促使他“励志勤力”，以图日后有机会效命朝廷。为了防止安逸清闲的生活磨损自己的意志，“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①长期坚持、乐此不疲，既用来增强自己的体魄，又借此以振作自己的精神。周围的不少人都对自己的上司这一举动有所不解，于是便纷纷向陶侃询问他这样做的缘由。陶侃对此作出了铿锵有力、气贯长虹的回答：“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②他的属下听了，都对陶侃的志向不胜钦仰。

朝暮运甓果真使陶侃增强了体质，并进一步磨砺了意志，避免了“不堪事”情况的发生。所以当王敦叛乱被平息后，陶侃即重新就任荆州刺史，活跃于中原战场的第一线，为国效命，名垂青史。

元昊十年戒契丹

元昊（1003—1048）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中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西夏政权的开国皇帝。史称他“性雄毅，多大略”^③。在位10年，励精图治，不忘戒备，开创了西夏与宋朝、契丹鼎足而立的局面。

宋天圣十年（1032），西夏主李德明去世，子元昊即位。当时西夏处于四强包围之中，东南与宋朝接壤，北面毗邻霸主契丹，西有宋朝支持的吐蕃、回鹘。年轻的元昊不愿受辽、宋节制，雄心称王图霸，决定暂与契丹联盟结好，首先摆脱对宋的臣属地位，然后再与契丹分庭抗礼，争霸天下。早先元昊父亲李德明立元昊为太子后，曾向辽圣宗提出求婚，联姻结好，辽圣宗欣然允诺，但不久，辽圣宗和李德明相继死去。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后承父允诺，当年便把辽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兴平公主是辽兴宗的姐姐，因此元昊被辽封为驸马都尉。婚嫁这一天，元昊率骑兵数万隆重迎接新娘，以示敬意，讨得兴宗的欢心。西夏与契丹固有的对宋同盟，由于和亲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西夏与契丹尽管有联姻同盟，但元昊深知契丹国的贪婪和阴险，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这种同盟只是一纸君子协定，一旦同盟破裂就可能化玉帛为干戈。所以元昊始终对契丹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为获得长治久安，元昊强国巩固，整军经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军事改革。他重新立军名，定兵制，组建强大的军队，规定：“男子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贍一人为一抄。负贍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贍，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④由是元昊组建一支五十余万人的强大军队。此外，元昊另建有擒生军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⑤，做为机动部队。在此基础上，元昊又制定出一整套作战方略与战略战术，平时注重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时刻警惕

①② 《晋书》卷66《陶侃传》。

③ 《宋史》卷485《夏国上传》。

④⑤ 《宋史》卷485《夏国下传》。



外来的侵略，“昼举烟扬尘，夜篝火以为候”^①，常备不懈以事不测。

在兵力部署上，元昊以十万大军配置在夏宋边境上，用以对宋的战争。以三万军队配置在西夏与吐蕃边境上，对付吐蕃和回鹘。西夏与契丹虽联姻结盟，但元昊仍将七万大军常年配置在夏、契边境，以备不虞。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元昊安不忘危的结盟不忘戒备的思想。

元昊改革军政，整编军队，国势日强，要求宋王朝承认他的皇帝地位，欲与宋朝平起平坐。宋帝大怒，举兵来攻。从宋康定元年（1040）起，宋夏战争频繁不断，元昊屡获大捷。先是夏军巧破金明寨，生俘宋将李士彬。接着两军大战三川口，刘平、石元孙所率宋军全军覆没。庆历元年（1041），宋将任福军万余人又惨败于好水川。庆历二年（1042）元昊集结十万大军进攻宋军，再败宋将葛怀敏于定川寨。至庆历四年（1044）宋夏和谈，达成协议。宋每岁给币二十五万五千两，封元昊为“夏国主”。元昊实际上摆脱了宋王朝的控制。

尽管这四五年对宋大举用兵，但元昊始终没有放松对契丹的警惕，布防在契丹边境上的七万夏军未予抽调一兵一卒。秣马厉兵，巩固备战，防御契丹军的偷袭。在宋夏战争中，契丹不愿意看到西夏的力量过于强大，不仅不帮助西夏，反而向元昊施加压力，要他不要攻宋，引起了元昊的不满和警惕。庆历二年（1042），居住在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和山西族人投附西夏，契丹“兴宗责还，元昊不遣”。最终，契丹打破与西夏的同盟，不顾“甥舅之亲”，对西夏发动战争。

庆历四年（1044），耶律宗真亲率契丹骑兵十万出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耶律重元率七千骑兵出南路，萧惠率军六万出北路，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由于元昊几年来警戒契丹常备不懈，在十余万大军突袭面前，西夏军从容不迫，奋起应战，战略部署有条不紊。元昊审时度势采取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的作战方针，“卷迹藏声，蓄盈待竭”^②，下令部队一退再退，先后凡撤三次，每次撤退都放火将沿途数十里田园焚烧夷尽。契丹军所到之处，兵马无所食，人马疲惫。契丹兴宗无奈，被迫和谈，但元昊却故意拖延时日，促使契丹军人马益加饥困。元昊见时机成熟，率军发动反攻，契丹军被打得大败，人马自相践踏，伤亡惨重。西夏军乘胜追击，攻破耶律宗真的大营，耶律宗真仅率少数侍卫逃跑。此战后，西夏一改原来依附契丹的屈辱地位，西夏与宋朝、契丹鼎足而立。元昊“王霸”之志终于得以实现。

元昊安而不忘危，结盟不忘戒备，身处四强之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使自己立足于一个主动有利的地位，最终使一个小小的割据政权，迅速上升为大夏王朝。元昊的这种常备不懈的治军思想值得后代兵家很好的学习和借鉴。

阔里吉思常备不懈屡获大捷

阔里吉思是元朝蒙古族将领，元世祖忽必烈长子真金的女婿。为人“性勇毅，习

① 《宋史》卷486《夏国下传》。

② 《卫公兵法·将务兵谋》。